

野哭

弘光列传

李洁非明史书系

李洁非
著

野哭 弘光列传

李洁非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野哭:弘光列传/李洁非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3

ISBN 978-7-02-009840-8

I. ①野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历史人物—列传—中国—南明 IV. ①K820.4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89186号

责任编辑 刘 稚

责任校对 杨益民

装帧设计 刘 静
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424千字
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32 插页37

印 数 1—8000

版 次 2013年6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840-8

定 价 53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序

两年间,都在从事关于明末弘光朝的写作。去年写完一本,《黑洞:弘光纪事》,是从专题的角度来写,写了十个问题。这一本写人物,名之《野哭:弘光列传》。

书名取自少年英雄夏完淳的《细林野哭》。我在《夏完淳集》里一见到,就被“野哭”两个字攫住了,觉得有股异样的力量。“野”在古汉语,有无家、荒芜并兼野鄙陋文诸意。“野哭”并非只在完淳的笔下出现过,其他朝代,亦有以此为题赋诗者,如唐刘叉之七古,清沈曾植之五律等;但我感觉,似乎用于明清易代之际,这词才格外有百感交集的况味。

弘光年,是明为清亡真正而确切的时间。中国历史,在此面临一个大节点。盖自宋代以来,中国自身文明经二千年世界领先的农业生产、社会发展所积累的物质和精神财富,已开始闪现向新的文明阶段跃升或转型的轨迹,《万历十五年》曾称宋代诸多方面“已如现代国家”。惜为蒙元所灭,上述进程中断一百年。好在这一百年,从全球范围看,时间尚不紧迫,中国还耽误得起。蒙元被逐,重回荒漠,明继宋起,在思想、文化以及经济发展上,全面祧续宋人。明是个很奇特的朝代,一面很是衰迈、昏黯以至暴虐,一面又孕育着朝气蓬勃的社会历史因素,逮至万历年,各种突破迹象已十分明显。然天不佑中华,明朝自身积攒的激烈社会矛盾终于爆发而导致严重内乱,同时,曾为蒙古所败的金人后裔,在沉沦荒蛮、几近湮灭三百年后,重获新生,日渐具备强大破坏力,而益为明朝大患。内外双忧,并至齐发。明遂先于甲申年(1644)失北都,复于乙酉年(1645)丧南京,终于灭亡。这是继宋亡之后,作为汉族国家的中国第二次整体亡国。但这次后果更为惨痛,原因是同时西方的欧洲也开始其现代转型。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文化积累来

看,东西方世界本可谓棋逢对手、铢两悉称,正待好好比试一番。可惜,中国却因一个意外情形,从竞赛中退出了——好比奥运会选手在起跑时却突然退赛。

我们于中国因被满清所主所遭受真正损失的解读,不在民族主义方面或感情。这当中,过去不太注意或很少谈论的,是新统治者与中国文明之间有很大的落差。随之,带来两个后果,一是本身创新能力已然不足,次而,作为异族入主者又势必采取精神思想的高压与箍束。两个因素交织,造成各种羁绊,令中国活力顿失,而严重拖了历史后腿。事实证明,有清一代,中国虽能秉其发达农业之优势,以及在东方暂无敌手之地利,续其强盛国势至康雍乾时期,但在思想、制度和经济上,却无变革迹象。满清的好处是,总算比蒙元能识良莠,虚心接受、学习和融入高等的文化;而它的问题是,受制于自身高度,只能亦步亦趋,照搬照抄前朝,论创新的能力,实在不足观。这对中国,无形中是多大拖累,后人很难设身处地体会到。实际以明代最后五十年思想、政治、社会的情形来看,若非这一干扰,中国经过当时业已启动的思想启蒙,得以进入制度变革、完成历史蜕变,可能性相当大。然而,异族统治尤其是文化落差,突然间扭转了历史方向。中国落在西方后头,关键就在这二百余年。我对满人这民族不抱偏见,但从历史角度说,满清统治在搅扰中国历史进程这一点上,实难辞其咎。此事若发生在中世纪,犹可另当别论。晋以后北中国有五胡之乱,唐以后五代也曾短暂如此,后来金灭北宋、蒙古亡南宋,每一次都对文明造成破坏与羁绊,情况也越来越严重,但我们觉得基本可以仅作为民族冲突来看,还谈不上扭转中国的历史方向。那是因为,第一,整个人类文明尚未到打开一扇新门的时候,世界历史还处在旧的格局当中;第二,中国自身也没有真正的新萌芽发育和生长,社会生产力以及配套的制度还算适合、够用,变革与突破的要求实际并未如何感受到。可十七世纪全然不同,人类近代化已肇其端始,中国在旧制度下的苦闷也忍无可忍、正待喷薄欲发,偏偏这个当口,满清来这么一下子,真的令人扼腕。

故而明亡时刻,主要在这一层,才是中国历史值得高度关注的重大节点。对于它的历史与文化后果,当时中国不少杰出人物,便有明白的认识或强烈预感,后来反而认识不如当时清楚。鸦片战争以迄日本侵华,中国有将近百年处在生死存亡之间,故明季这段历史,因此被“触景生情”,更多从亡国之痛、民族冲突意

义上,被近世夺为酒杯,浇“爱国”之块垒,这也没有什么不对抑或不可,问题在于这段历史本身所含问题及所达深度,实际远逾乎此。我觉得,黄宗羲、吕留良、徐枋等人思想里都隐约有这样的看法:明亡本身无甚可“痛”;可“痛”者,乃是明为清亡,亦即先进文明被落后文明所毁。那意味着,中国从一个已经达到的历史高度,大幅跌落并裹足不前。这才是明清鼎革无限悲凉处,不知此,对于“野哭”二字只怕难会其意。

不能从文明的损失着眼,矻矻于民族情绪,会使我们错失这段历史的真正教益。对各国历史来说,民族问题其实都是动态的,古代中国讲“夷夏之辨”,但这字眼简直无法作历史的推求,不要说满清、蒙古、西域诸族,如果推到商代,连周人也算“外夷”。何况沿着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朝前走,往往还将去往反方向,实用主义地模糊一些是非。即以清朝来论,当它作为入侵者、亡中国者时,固然是被痛恨的,但当它为中国带来大片疆土之后,好多人又破涕为笑,荣耀地认作一个伟大朝代。将近四百年来,明清易代这件事的真正意义,就这样被模糊、被遗忘、被丢弃,而彼时一代甚至几代中国人的苦痛酸辛,都成了过眼烟云。

我对短命仅一载的弘光朝感到不能放下,盖出于不忍以上况味就这样付诸流水,而想把它重新唤回于人们记忆,于是,钩故索旧、大书特书。《黑洞》把对弘光朝的所感所思,提炼为十个问题。《野哭》则换换方式和角度,借十余位在不同侧面有代表性的人物,来加呈现。我希望,借助于选材,加上我初浅的研究与表现,让这有转折点意义的时刻,得还鲜明。

被安排于书中露面的,有朱明王朝确切的末代皇帝朱由崧,有弘光枢臣和关键人物史可法,有称为“明代苏武”的左懋第,有以兵变致南明解体的左良玉,有普遍目为南京祸根的阮大铖,有秦淮河畔苦闷的青春叛逆群体,有时代思想高度的体现者黄宗羲,有以十七龄慷慨赴死的少年天才夏完淳,有传奇说书家柳敬亭,有“遗民现象”的典型徐枋……他们的身份,涉及帝王、武人、士大夫、学生、妓女、艺人、学者、隐士、起义者,还算广泛,覆盖了社会多个层面。

写作方法,也得考虑。过去说“文史不分家”,其实不对。文、史是分家的,或者说应该分家。文学和史学,一为艺术,一为学问;一个是主观、情感的表现,一个是客观、事实的陈述。不分家,既不合道理,还有不少副作用。中国史学某些

先天不足，即因“文史不分家”而来。或者以美恶代替事实，或者视史撰如说部，觉得添油加醋、“支离构辞，穿凿会巧”^[1]，关系不大。所以对本书这一类写作来说，“文”与“史”的确是一对矛盾，处理不善，极易“以文害史”。我给自己立了规矩：文史分家，才学相济。前半句讲要以史学为本，绝不让文学的东西有损史学；后半句讲另一面，即才足以济学，不能只剩下干巴巴的“学”，成了寻章摘句、掉书袋，而触碰不到历史的人性内涵。

具体讲，直到现在，关于传记写作还有不少人主张可以虚构，认为写到细节的时候如果史料不足，只好用虚构和想象加以填补。诚然，写作者有他的难处，史料总有所不足、有所不能到，因此，发挥一些想象，加点虚构，好像在所不免。问题是，没有哪位作者高明到能够确保他的想象或虚构可以符合实际。由于自认不能这样高明，我是宁付阙如，绝不虚构。还有人认为，传记写作免不了来点虚构无关史料和事实，而是基于叙事美学的理由；似乎不如此，人物很难鲜活，个性挖掘和表现就不能深入。这只是一个错觉。小说极盛时代以来，作家们普遍习惯于或过分依赖虚构，好像文学性便等于虚构。其实，虚构既非文学性的来源，亦非它最上乘的功夫。离开虚构便有些不知所措，乃是文章活性衰退所致。倘如语言有质感、有温度，非虚构非但不损失文学性，相反本身就带来独特的文章之美和阅读快感。当然，我们也确读到很多乏味的、史学足而文学不足的传记作品，但它们的问题都出在语言上，并非因为不擅虚构。

既然不用虚构，《野哭》便奉行“有一件材料说一分话”，做到人物言行（哪怕只言片语）、事件始末（哪怕细枝末节）无一字无来历，全都有案可稽。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引文，据自何人何书，从版本到页码，我们都各具其详，以便验核。我没办法保证这些材料的原始真实性，但可以保证自己不曾脱离史料，另外虚构或杜撰过什么。这当中，有时涉及到同一事不同材料间的差异，倘在能力范围内，我也试予考证、辨疏（例如史可法的生年问题），以求去伪存真。

这样做，真正目的是想对历史拿出诚意。我觉得这正是我们一直缺乏的，而

[1] 刘懿著、周振甫注《文心雕龙注释》议对第二十四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，第266页。

且越来越缺乏。虽然对历史的诚意，并不在于形式，但以我们现实来论，即便只是形式，也非常重要。形式至少有助

于约束我们,不是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。我们说的每句话、每件事是有出处的,可查可考;这样,如果我们断章取义、夹带私货了,别人可以立予核实、指出或提出商榷。

历史需要敬畏。谰弄历史,无利可图。以历史为妾妇,呼来斥去,有时颇为快意,但就如课堂上不好好听讲、调皮捣乱的学生,到头来要懊悔的只有他自己。历史是一位好老师,它嘴里说出的每句话,都是可让人受益解惑的知识,应该注意听讲。

与此相关,又有四个字:尊重古人。可能是自视高明,当代史学多年来惯于对古人颐指气使。有时横加指责和训斥,有时相反,用当代思想感情拔高古人。对人对事都是如此,屡用今天义理来裁量,或强求、或曲解。姑举一例,比如史可法,有人嫉之如仇,原因居然是他为弘光朝制订政策时置“灭寇”第一而以“御虏”第二。然而,身为明朝大臣,这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。当时,李自成对明朝有“君父之仇”,满清名义上却替明朝报了这君父之仇(此即为何起初明室以“申包胥哭秦庭”故事视吴三桂借兵)。依礼法来论,“灭寇”第一乃明朝必有之义,不单史可法,孙可法、张可法、胡可法,不拘谁当那个东阁大学士,都得这么制订政策。今人尽可因自己立场而爱戴李自成,但若嗔怪明朝的首相史可法不具同样感情,就不免鸡同鸭讲了。凡此,即因不守“当时事,当时语”的原则,而那不过是史学不失客观性的起码要求。后人或许是比古人高明,但不要以此笑古人,古代的事情有它自身道理和原由,嘲笑和批判之前,至少该向读者讲清楚古人何以作此想、有此举。

类似还如孙中山称赞洪承畴:“五族争大节,华夏生光辉。生灵不涂炭,功高谁不知。满回中原日,汉威存多时。文襄韬略策,安裔换青衣。”^[1]较之当年,竟是南辕北辙了。关于“生灵不涂炭”,以我们知道的论,洪承畴降清实在不能说起到这种作用。清兵入关后,北方基本未闻屠戮,只因各地望风而降、未加抵抗,后来到了南方,凡不肯降的地方,都发生大屠杀。故而,非得称赞洪承畴“功高”,只能落在“力促中华一统”、“满回中原日”这层意思上。俗白地讲,洪承畴投降, [1]王宏志《洪承畴传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9,第410页。

好就好在让中国版图扩大了。这,一是

结果论,二是实利论——因有如此的结果和实利,便对事情另抱一种观点。但依同样逻辑,吴三桂的形象是不是也该变一下呢?看不出为何厚此薄彼。莫非因为吴三桂后又反清,洪承畴却只对大清忠心耿耿?古时有古时的语境和是非,因而比较稳妥的办法是,一面可以就古今的不同做出说明,一面对过往历史还是坚持“当时事,当时语”,不妄自改易,否则就会人为造成很多混乱,终至于无法收拾。

略事申陈,权为引子。

朱由崧

偶然的谢幕人

当马士英派人在淮安找到他时，他与一个叫花子相差无几，囊囊一空，靠向潞王借贷维生，头上裹着粗布头巾，衣袍是破的，腰间所束不是与身份相称的玉带，而是普通官吏乃至庶民所用的角带，他的一班随从甚至只能穿着草鞋。

我们接触一个人,不论在现实中或借助于想象,首先会在意他的模样,即平时所谓“音容笑貌”者。究其原因,尽管我们不是相面家,却对来自相貌的各种信息充满渴望,如不能觅得,就有雾失楼台之感,好像难以真正走近那个人。谈起弘光皇帝朱由崧,我便颇有此感。古代为帝王者,御容都要经宫廷画师描摹成图,虽往往加以美化,或者,因刻意比附隆准大耳一类所谓“帝王之相”而流于雷同,却总各有影绘存世。明代凡在南北紫禁城龙床上坐过之人,太祖朱元璋起,都有写真;惟两位例外,一位是惠文帝朱允炆,一位便是后来庙号安宗的弘光皇帝朱由崧。朱允炆画像原来想必是有的,而被他的叔父朱棣抹得干干净净。至于朱由崧,考虑到满清对崇祯以后史料能毁即毁,也不能断言他的形容根本不曾敷于纸墨,但作为眼前实际,我们确实不曾见到。说到这一点,他还不如自己的好些臣子。后者在刻行于世的文集中,或在族谱宗祠里,还往往留有图形。我又曾指望到文字资料中,找到有关他面貌的描写,结果也无所获。那些记述,只在意他的身份,不关心作为个人他有怎样的形态,纵有稍微具体些的笔触(那是很难一见的),仅及于他衣着上的变化,那也是因为这种变化与他的身份、境遇有关。总之,无论图与文,我们都得不到对于他面貌的认知。一次,从《眉叟年谱》读到对南巡时康熙形象的描绘:“予随众瞻仰,见圣容微黑,大鼻三须,坐船首,一人旁执盖。”^[1]虽着笔甚简,视线亦属遥遥一瞥,但还是给出了玄烨具体的形象。我对朱由崧形象所欲得者,仅此亦可,而竟不能。

这除了使我有些惊讶,也引起别的
思索。他也许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人
物,但好歹曾为君上,在世间的痕迹怎

[1] 许洽《眉叟年谱》,《丹午笔记·吴城日记·五石脂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9,第255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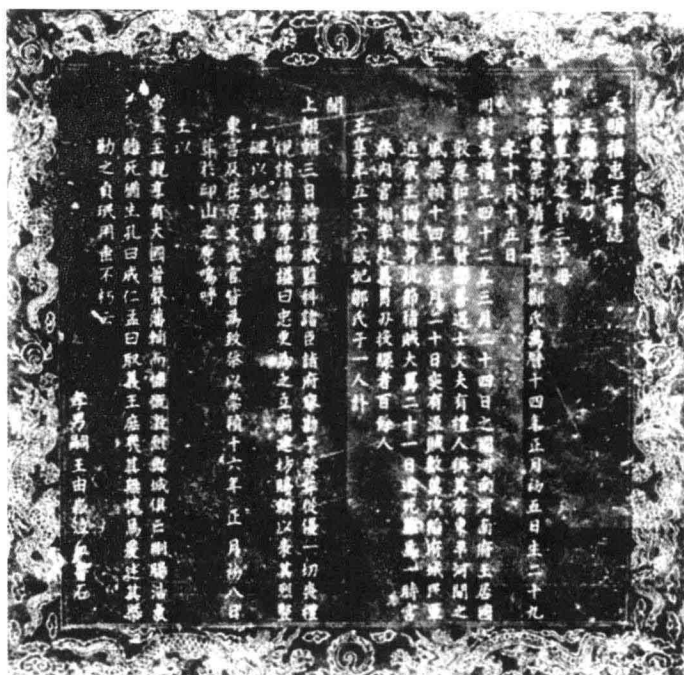
会如此之浅？当世之人为何不约而同给他以同样的忽视？那张脸，好像可有可无，不值一提。也许，并不出于忽视，而是来自一种虚离感。他短暂生涯，本有许多断断续续、亦实亦幻、真假难辨之处；而在南京的一年，倏忽而来，倏忽而去，萍飘蓬转，即之则杳，有如匆匆过客。从这意义上说，形象的阙如，似乎倒比较真实地反映着他在现实和历史中的处境——一种令人悬疑困惑的幻影般的存在。

二

其实，他的存在有真实的一面。这种真实性，直到少年时代还很具体。他生于万历三十五年七月乙巳日，换成公历则是1607年9月5日。父亲是万历皇帝第三子、福王朱常洵，母亲姓姚。他的乳名叫福八，听上去容易误为朱常洵第八子，其实是长子，且别无兄弟。母亲姚氏大概死得早，后来被他从河南迎到南京的母后邹氏，并非本生母。他应该算北京人，不光生在那里，且一直长到七岁才离开。万历四十二年，经过久拖、耗费无数口舌乃至酿成宫廷谜案之后，万历皇帝终于决定福王去洛阳就藩。朱由崧在那里度过平静的二十七年，平静到没有多少消息，我们只知这段时间他先是受封为德昌王，后晋福王世子。对于乃父的生活，《明史》亦仅以“日闭阁饮醇酒，所好惟妇女倡乐”^[1]一语蔽之。

经过二十来年的沉寂，崇祯十四年起，有关福王一家的记载突然又多了起来。原因是李自成攻陷洛阳，朱常洵惨死。这件事，让福王一家重回社会聚光灯下。二十年前，由于“三案”缘故，他们曾占据这样的位置，随着崇祯即位、钦定逆案，波澜平伏，事情渐渐过去，他们也淡出政治焦点，在洛阳过自己花天酒地的日子。而那个冬天，朱常洵被杀，且死得那样恐怖——尸身被分割，与鹿肉同煮，名为“福禄宴”——震惊了全国。作为最有钱势的亲王，朱常洵如此下场，无疑是深刻象征，而刺痛很多人的神经。深受打击的，包括崇祯皇帝本人。洛阳事变后，他派人四处找寻堂弟下落，当听到朱由崧流落民间、衣不蔽体的汇报，皇帝泫然泪下，专门拨银三万一千两，派司礼监王裕民送去。以当时国库的捉襟见肘，这笔钱已是巨款，从中可以体会崇祯内

[1] 张廷玉等《明史》卷一百二十，中华书局，1974，第3650页。



《大明福忠王圻志》

1924年发现于河南孟津麻屯乡庙槐村南。福忠王即被闯军烹而食之的朱常洵，“忠”是谥号。立碑人即本文主人公、日后的弘光皇帝朱由崧。此碑该算福王父子留存于今极稀少的痕迹，但上面所谓“王独挺身抗节，指贼大骂”，“慷慨激烈，与城俱亡。刚肠浩气，虽死犹生”，却属瞎编。



潞简王陵

潞简王乃第一代潞王、朱常涝之父朱翊镠，与万历皇帝一母同胞，就藩河南卫辉府，1614年薨，谥号“简”。因死在乱世前头，故还能建这样的陵墓。甲申年（1644）正月，朱由崧投卫辉朱常涝避难，然后从卫辉启程，逃往淮安。

心浓厚的悲郁与恐惧。过了几个月，又颁旨朱由崧嗣福王位。

随着洛阳之变，原来寂寂无闻的福世子开始受到舆论关注，他的逃脱，他的流浪，他的穷困，他的寄人篱下……频频见诸报道和记述。有关他的故事如此之多，大大超过他过去二十多年经历的总和。照理说，他的形象应该由此变得清晰和具体了，实际却刚好相反。他的确越来越多在各种传闻里被提及和曝光，但他究竟是怎样的人这一点，反而更加混乱。有关他的描述，充满了道听途说，在时间、地点和过程上淆乱不一。这明显是乱世的作用。比如，他如何从洛阳脱身，以及脱身后到卫辉依潞王朱常涝这段时间当中的行止，既不确定也不连贯，至今史家不能使之凿实、次第完述，都只能囫圇了事。这留下了许多疑点，而各种对他的怀疑也就趁隙而入，直至有真假福王之论。

到此回看其平生，也有趣得紧：幼年他的消息少而简单，但那时他的真实性反而不成问题；现在消息虽然越来越多，他却变得越来越不可靠。表面上，他愈益进入人们视野，实际却离大家越来越远。这颇像结构主义中所指与能指之间那种奇妙的关系，能指愈丰富，所指便愈模糊。朱由崧从福八而福王，从福王而弘光皇帝，在历史舞台上一步步由远而近，渐渐趋向最前台；但当他终于站在大家面前，大家反而不知道他究竟是谁。

三

这种怀疑或不信任，在弘光末期达到顶点。当时，一起童妃案，一件太子案，都造成朱由崧到底是真是假的严重怀疑。人们猛然觉察一个很要命的问题，亦即，眼前这个据称是福王、大摇大摆坐在皇位上的人，事实上没有一个人知其底细，抑或，根本谁都不认得他。南京上上下下大小臣工，过去均未见过朱由崧。他确是依潞王来到淮安，但潞王也不能作证此人就是福王朱由崧，论起来这二人虽为叔侄，过去却也例未谋面，当初朱由崧是自行投奔卫辉潞王府，他提交了什么凭据，使朱常涝相信他便是皇侄朱由崧呢？我们并不了解。从始至终，我们只是知道有几位所谓福王府仆从一直追随左右，为他提供身份证明——万一这些人本身就是假的呢……钱秉箴曾就童妃案，写讽刺诗《假后》云：“福国昔破散，骨

肉如飘蓬。诸王更衣遁，妃主不得从。……不识今上谁，空死囹圄中。”^[1]又于《南渡三疑案》中说：“童氏出身不可考，而决为德昌王之故妃也。”^[2]意思很清楚，疑朱由崧而不疑童妃。这在当时，是非常普遍的看法。尤其经过失败的一年，大家对于“破散”、“飘蓬”期间朱由崧的踪迹无法征信这一点，很乐于理解为这位弘光帝其实是个赝品。最离奇的说法见《甲申朝事小纪》：

马士英抚凤阳时，有以居民藏王印首者，取视则福王印也。询其人云，有博徒，持以质钱，士英因物色之。士英与王初不相识，但据王印所在，则以为真世子。^[3]

依此，在南京当皇帝的那人，不过是持有福王印的某位赌徒罢了。

不过，南京的一年当中，他又回到了真实。不管前头的经历如何扑朔迷离，他做了弘光皇帝、在南京临朝一年，这可是真真切切、有目共睹。我想如果与之面对面，我将对他这样说：我也许并不知道你究系何人，但我知道你是弘光皇帝。固然，他可能是个假冒的福王，但作为弘光皇帝却并非假冒，而是经南京重臣会商决定并专门迎送，又经过正式典礼确认的。他是一个真实的皇帝。

但接下来，若问真实的弘光皇帝到底是怎样的人？我们不免又含糊起来。史述中对他有大量、压倒性的负面描写。集中在两个方面。一是与马士英、阮大铖狼狈为奸，定策前主动联络马士英为己争位，登基后对马、阮言听计从、任其操柄。一是荒淫无度，纵酒滥性，尤其是喜好幼女，甚至彻夜痛饮而淫死幼女……这些描写，有些确有其事，有些却只是想象。假如我们希望还他一个本来面目，而不只想找一个历史替罪羊，对这些描写就需要给予细致的分辨。凡属于想象的，都将其剔除于事实之外，而不论这类话语多么甚嚣尘上、众口一词。即便确

有其事的那部分，也不能就事论事，不能孤立、单线条地看，而要深入一层看前因后果，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。我们这样慎重，实在并不为着朱由崧的缘故，他个人的毁誉，说实话无关紧要，问

[1] 钱仲联主编《清诗纪事·明遗民卷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87，第375页。

[2] 同上，第380页。

[3] 抱阳生《甲申朝事小纪》，书目文献出版社，1987，第538页。

目 录

001...序

001...朱由崧 偶然的谢幕人

025...左懋第 一个人的证明

055...史可法 抛骨竟无家

091...四镇 孤城落日斗兵稀

119...名姬名士 革命和爱情

149...黄宗羲 裸葬的情怀

191...阮大铖 诗与人

233...夏完淳 才子+英雄

259...柳敬亭 被删改的传奇

285...龚鼎孳 我原要死,小妾不肯

315...徐汧 士与死

341...左良玉 杀掠甚于流贼

371...徐枋 绝代之隐

411...附 辛巳、壬午开封之围

442...后记